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離詞、辯言與聞道：論戴震《屈原賦注》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6-2411-H-004-031-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廖棟樑

計畫參與人員：此計畫無其他參與人員：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年09月18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離詞、辯言與聞道——論戴震《屈原賦注》

計畫編號：NSC96-2411-H-004-031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0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廖棟樑

結案報告

【中文摘要】

戴震著述甚豐，治學範圍亦甚廣。《屈原賦注》是戴震的治學方法在研究文學作品上的充分體現。本計劃擬闡述在樸學的文獻主義風氣下，戴震如何通過「離詞——考據」，小學訓詁，稽古鉤沉；「辯言——文章」，審其結構，考其性情；以及「聞道——義理」，索解意圖，抉闡心曲三者，勾聯出複雜章句背後可能或本應存在的屈原「本意」，藉此，反照自身，闡明心志，以資自勵。俾以說明《屈原賦注》在「楚辭學史」的價值與定位，並且，證明晚年所著的《孟子字義疏証》的哲學觀點，早已在年青時期所著的《屈原賦注》中稍見端倪，標誌著戴震思想的一貫發展，而研究戴震者實不應忽視此書。

關鍵詞：戴震、屈原賦注、考據、文章、義理

【精簡報告】

一、

中國的學問原本就是重視綜合性的，一種以人文價值為核心的學問，戴震體現的也是這種綜合性的精神。所可惜的是，受到西方學術分科觀念的影響，以及大家對清代樸學的刻板印象，近代研究戴震學術的學者，大致區分為兩種：研究哲學的人，一般多偏重於戴震對於「理」思想的討論；研究經典考據的學者，則多偏重於「文字名物、典章制度」的討論。前者多注意戴氏《孟子字義疏証》一書，後者則多研究他的經學考據著作。至於文學成就則被忽視，戴震既豐且深的文學理論和實踐，包括《屈原賦注》都不為學界所看重，閒置僻處，無人問津。即使有人研究《屈原賦注》也都集中在論述其小學成就。本計劃就是要強調戴震的考據訓詁與義理思想以及文章欣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通過《屈原賦注》作為例証，希望能還給戴震一個完完整整的思想和人格。余英時的《論戴震與章學誠》，尤其是其中的長文〈戴東原與清代考証學風〉，專門討論「有志聞道」的戴震，如何在「義理」與「考証」兩種趣味之間掙扎。他說：「東原平生學術兼跨義理與考証，然而細察他對於這

兩門學問的不同態度，可知他內心始終偏向義理。……及至晚期，他在思想方面卓然有以自立，乃絕彼紛華，還我故態，仍以義理為其心靈的最後歸宿之地。」所謂「故態」，早年所著的《屈原賦注》即是明証。緣此，盼透過本計劃之研究，當可開顯「楚辭學」及「清代楚辭學史」的新貌，也可豐富、深化戴震的研究。

## 二、

《屈原賦注》完成於三十歲時，屬於戴震的早期作品。戴震之注《楚辭》，頗有些令人詫異。他在少年時期就繫心儒學；稍長，即有志於聞儒家聖賢之道：「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為此，他用三年時間讀《說文解字》，廓清語言文字方面的障礙，又費時十年研究天文、律曆、地理、數學、音韻、動植物、典章制度、醫學、史學等學科，先後著成《籌算》、《六書論》、《考工記圖》、《轉語》、《爾雅文字考》、《孟子私淑錄》等。可以說，他為明經求道已經作好充分的準備。接下來，順理成章的工作應是對儒家經籍進行解釋、闡述或議論。事實上，戴震於三十一歲已完成《詩補傳》，不久又提出撰《七經小記》的宏偉計劃。然而，註群經之前，戴震卻選擇屈賦作注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原因之一，與戴震當時的處境有關。「其年家中乏食，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為饗飧，閉戶成《屈原賦注》。」「處窮而彌堅」，是屈原精神的寫照，戴震身處逆境而注屈賦，蓋有自勵的意思。原因之二，與戴震對屈原作品的認識有關。在《屈原賦注初稿自序》與《屈原賦注自序》中，戴震兩度申明他對屈原的看法是「經之亞」，將屈賦視為準儒經。所以他注屈賦，與他的治學中心並不衝突。

我們再由戴震的生平可以看出，屈原及其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尋常。戴震生前用過一個別號、二個閑章。別號「葦荷散人」中「葦荷」一詞乃是《湘夫人》「芷葦之兮荷蓋」一句的縮略。閑章「恐修名之不立」與「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更顯然是《離騷》與《湘夫人》中成句。據現有資料來看，戴震一生用過的別號僅此一個，閑章也僅此兩枚，而它們竟全部取材、取意於屈原作品，這就很值得玩味。更重要的事實是，《屈原賦注》刊行之時，他曾親命胞弟專程將書稿送呈學士盧文弨而約請為序。後來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戴震與段玉裁書云：「今夏纂修事似可畢，定於七八月間乞假南旋就醫，覓一書院糊口，不復出矣。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余力整其以前所訂於字學經學者。《四庫全書》例於現在人撰述不錄，僕之《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年（按：當指乾隆三十八年癸（1773），戴氏亦以是年入四庫館充纂修官。）江南巡撫曾取以進館中，依例去之。今大著（按：此指段玉裁之《六書音·表》）亦不得抄入。」顯然到了晚年他還是一直為該書未被收入《四庫全書》而深表遺憾。可見戴震對《屈原賦注》的撰著、印行與存傳如此熱忱和鄭重，似已不再僅限於學者對其著作的自我珍愛之情。

戴震用以詞通道的治學方法，在語言文字、自然科學、哲學諸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歷來的戴震研究者卻大多看重其考據和思想方面，而忽視了其文學方面的成就。其實，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即云：「先生嘗言：『做文章極難，如閻百詩極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顧寧人、汪鈍翁文章較好。吾如大爐然，金銀銅錫入吾爐一鑄而皆精良矣。』蓋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由此可見戴震對文學的認識態度和自我文學成就的評價。固然從戴震論「義理、考核、文章」的關係，可見其學術立場是「道」

為首、「藝」為次，道本藝末，不過，他也言三事善用相濟之道，也主張「文道合一」，二者不可偏廢，所以，他絕不排斥藝、文在文章中所產生的作用。

繼承前輩學者關於義理、考據、文章的論述，戴震認為義理是學問之源，學問之本，考據是尋求義理的方法，而文章之學則可作為義理的載體，即「以聖人之道被乎文」。他在〈沈學子文集序〉中說：「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辯言，終乎聞道。離詞，則捨小學訓詁無所藉；辯言，則捨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離詞」需通小學訓詁，稽古鉤沉，「辯言」要有立言之體，賞文析義，此即考據、文章，二者是聞道過程中不可缺失的環節，聞道則是目的。「考據——離詞」、「文章——辯言」、「義理——聞道」正是《屈原賦注》詮釋屈賦的三個層面與路徑。

### 三、

按照戴震「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的治學途徑，他指出：「鑿空之弊：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訛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謬者，所據之經，並非其本經。」《屈原賦注》即運用訓詁考釋的方法，實踐他的理論主張。通字義，可以稱為「語言的理解」；通名物制度則是為了達成「歷史的理解」。戴震在《屈原賦注·序》中，批評以往「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他的《屈原賦注》於是在「考識精核」方面下了極大功夫，主要是對名物、典章制度的考釋，這不僅反映在隨文注釋的篇幅中，還尤其反映在〈通釋〉、〈音義〉中。〈通釋〉二卷，上卷疏証山川地名，下卷疏注草木鳥獸蟲魚；〈音義〉則定其音讀，列舉別本字句的異同。其他諸如重視方言字詞，運用古音聲訓等等也都各具特色。注釋皆有理有據，甚為可信，凡本無把握者，均寧缺勿濫，存而不論，可見其治學的嚴謹，並展現其「指博而辭約」的特色。早在漢代，王逸就用「章句」形式為《楚辭》作注，《屈原賦注》則是乾嘉樸學在《楚辭》注釋的體現。關於《屈原賦注》的考據，前輩時賢論述最多，係人所共知，且多為治騷者所汲取，故不必多言。

### 四

限於注釋體例，以字詞句為敘述對象，不可避免是零碎的，但戴震的用心，總是要用以表現整體的內容，所以，他關心文章結構，講析篇章大義。案「結構」在文學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卡西勒在《人論》中便指出文學的創造不是一種「非自願的本能反應」，而是一種「有目的性的」「構形」過程。那麼，在屈辭的藝術研究中，「結構」研究也得引人注目，正是從朱熹以後，不少明清學者才把屈辭的結構作為其藝術成就之一，予以關注。他們透視作品精嚴的結構，剖析其間起承轉合的內在關係，藉以推敲屈辭的字法、句法及章法。譬如：明汪瑗《楚辭集解》和賀貽孫《騷筏》對〈離騷〉的結構技巧特別是章句之間的啟承呼應作了闡明。清林雲銘《楚辭燈》便提醒讀者「最難讀者莫如〈離騷〉一篇，以其變幻瑰異，眩其重複，……但要知作者是何許人，處何地位，便知當日如何存心，如何落筆。茲尋出緒，分出段落。」王邦采曾說：「所貴乎能讀者，非徒論習其詞章聲調而已也，必審其結構焉，尋其絡焉，必考其性情焉。結構定而後段落清，絡通而後詞義貫，性情得而後心氣平。」（《離騷匯訂·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拾陸冊，頁98-9）王氏強

調讀〈離騷〉要「審其結構」、「尋其. 絡」、「考其性情」，這樣不僅能讀懂〈離騷〉，其他屈原作品亦自可迎刃而解。清初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則》不但在隨文注釋中對結構之妙時有精到之言，在〈餘論〉中更見集中論述。戴震後出轉精，分〈離騷〉為十大段，逐段加以評論，既闡釋各段大意，又揭示作者的整體構思。評語中「設為……」、「托言……」、「(假)借……」等措辭，對於理解《楚辭》的藝術性也都富有啟發。考察〈離騷〉全文分段，歷來有異。至清時分法已有多種，粗略統計有近四十種之多。大而言之，則可規為三分法、八分法、十分法，三大類。三分法可以王邦采《離騷匯訂》為代表，八分法可以朱冀《離騷辯》為代表，十分法則以戴震此書為代表。比較八分法和十分法兩種分段法，可發現戴震的自有特色。八分法主要是以人物活動、事態發展、時空順序等實體性材料劃分，重視詩歌的敘述性；十分法則主要是以情緒變化、感情波折、內心矛盾等心理線索劃分，重視詩歌的抒情性。概而言之，八分法重在「事」，十分法重在「志」。若從〈離騷〉為長篇政治抒情詩這一角度觀察，戴震的十分法可以說抓住了其詩的本質。(參見毛慶：《楚辭著作提要：戴震》)

## 五、

接著，戴震又講究文章的「文學性」，注重藝術品位，所謂「根葉並茂，少闕則非完物。」譬如他讚嘆「司馬相如〈封禪文〉，顏色如天上雲霞，奇麗絕。」段玉裁稱戴震曾編有《唐宋文知言集》曰：「集上理與辭俱無憾；集下則不惟其理，惟其辭。」打開屈原的詩作，誰都會有如猛然鋪展華彩四射的畫卷的感覺，禁不住為它的跌宕斑斕、浪漫飄逸驚嘆。緣此，戴震在注文的字裏行間也情不自禁地在〈初稿〉留下了50條眉語批注，對詩篇的藝術風格做了極其優美感性的文學批評，譬如〈離騷〉「女嬃之嬋媛兮」句，他眉批曰：「此段設波瀾起」。〈離騷〉「陟升皇之赫戲兮」句，他眉批云：「一折轉便住，情辭痛絕，更不能著一語。」〈東皇太一〉「芳菲菲兮滿堂」句，他眉批說：「此歌語簡法嚴，以此明其敬肅。」〈湘君〉「朝騁驚兮江皋」句，他也眉批道：「遙接橫大江句，行文斷續之妙。」〈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句，他眉批曰：「此歌與〈湘君〉章法同而構思各別。寫水波、寫木葉，所以寫秋風，皆所以寫神不來，冷韻淒然。」凡此種種，隻字片語便中其肯綮，讓人讀來既予義理啟迪之同時，更得以美詞麗句的享受，一脫樸學的《楚辭》研究中偏重故實而流於繁瑣考據的板重呆滯。

再來，戴震在析詞疏義時，常能扣緊原作遙情度理，體會作品情境。譬如在〈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四句下，戴震釋為：「此亦託為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帝子降此北渚矣。意之之辭也。繼曰望之踰遠，使我心愁，但見秋風水波及木葉落。不與神遇也。」言湘君因不遇湘夫人而極望，望之越遠而愁越濃，目之所見，只有秋風、江水與落葉，這肅殺的秋景更映襯出了作者的愁情。由戴震的解釋中，可看出他深諳屈原明言湘君、湘夫人不致，實指己之被棄於人世的曲折之筆，故極力渲染作品中的哀愁、幽怨之情，顯然，戴震的體悟符合作品情境。此雖受林雲銘、蔣驥二家的啟迪，但又較二家更為文意貫通、契合原作情境。又如〈山鬼〉中，戴震分析整個作品，認為「三章之次，始望其來，曰意者君思我而不得聞乎？繼望之不來，則莫必其思我，而疑信交作也。終望之甚，曰徒我思君，如此離憂耳。」戴震的分析入情入理。由開始的「思君我而不得聞」，到「莫必其思我」，再至最後的「徒我思君」，反映出了山鬼

的感情變化，由信，到疑，再至怨。認為「通篇皆為山鬼與己相親之辭，亦可以假山鬼自喻。蓋自弔其與山鬼為伍，又自悲其同乎山鬼也。」這樣的分析，相當精彩。

## 六、

如同林雲銘所說：「讀《楚辭》，要先曉得屈子位置。」（《楚辭燈》）從《屈原賦注初稿》看，戴震說屈原的「怨憤」是因為君王不寤，黨人偷樂與時俗工巧，在〈離騷〉「惟黨人之偷樂兮」等句，他眉批曰：「君之疏己，皆由黨人，故先入黨人，逐篇反復言此，不敢懟君。」在〈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等句，他眉批道：「說到君便住，若因黨人帶出，又祇云信讒，立言婉曲之至。」到〈離騷〉「怨靈修之洗蕩兮」句，他也眉批云：「上章自明其心，此章怨言不察，〈惜誦〉所謂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注謂不察萬民善惡，《文選》注謂不察眾人悲苦，皆非是。」緣此，他肯定屈原的「怨」，揭示屈原的「怨」在於為「君」為「國」。晚期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証》中為了批判程朱理欲觀而提出「理存乎欲中」的觀點，他說：「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孟子字義疏証·理》）對照《屈原賦注》，屈原的「欲」就是「愁怨」，「愁怨」的目的在於「為」君國，這就是「理」。顯然戴震的哲學思想早在《屈原賦注》已見端倪，基本觀點相一致，研究戴震者，豈能不讀《屈原賦注》呢？再從《楚辭》學史來看，朱熹說屈原「抒怨憤而失中」，清初一些楚辭學者在「愁怨」問題上百般調和（見拙著〈〈離騷〉者，〈小弁〉之怨〉一文有詳細討論），卻不如戴震通情達理，合乎人性。

職是，他批判朱熹。朱熹說屈原志行或過於中庸，不足為法，他說屈原之心至純；朱熹說屈原為學，不從周孔而失於末流，他說屈原之學至純；朱熹說屈賦辭旨或流於荒誕偏激不足為訓，他卻說屈原立言指要歸於至純。如果說他在《毛詩補傳·序》云：「余私謂詩之詞不可知矣，斷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屈原「志在憺顧楚國」、「其心至純」，那麼，與《詩經》之「無邪」一樣的屈賦之「至純」，自然可謂「經之亞」了。

屈原是第一位在詩歌中表現對君國之認同、摯愛與使命感的人，自然對存在處境相若的後代知識人產生重大的影響，故而《楚辭》研究不僅是一種學問的鉅研，並且是文人思想感情的表現與發洩，眾多的研究者，無論考其文字，訂其音韻，或闡發思想，揭其微義，皆非單純的興趣所致，實有著審美情趣或思想情感共振的因素。循此，《楚辭》研究在詮釋目的上，表現出以「章句訓解」來探求屈原本意的同時，又常以之反照自身揭明自己的情志。戴震著《屈原賦注》時，家境非常貧困，段玉裁曾評述此時的戴震曰：「蓋先生之處困而亨如此。」一個「亨」字，昂揚挺拔，貧賤不移，直與屈原精神相通。職是，當戴震標榜屈原時，隱藏在背後的、沒有說出來的，何嘗不是戴震忠於自我的身分認同與理想。緣此，注騷由是展現出一股濃厚地「宗教情懷」特質。一方面源自於屈原的精神召喚，使戴震由注屈賦與千古之屈原同在；但在另一方面，當此情懷真實而篤定地駐立在戴震心中後，則戴震反過來成為守護屈原與《楚辭》的護持者，有意識有目的批注駁正前賢的謬誤。「今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瞻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其心，不受後人皮傳，用相眩疑。」